

論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的爭辯

董立文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系副教授

摘要

有關民族認同的兩個基本假設是：一、認同的本質就是對比、差異與分裂，而融合屬於建構的過程，目的是消除差異而達到新的認同。二、台灣認同之所以出現，恰恰是相對於共產主義中國而形成的差異，包括民主自由與一黨專政的對立、社會價值一元與多元的摩擦，政策上壓制與反抗的互動的整體歷史積累。「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最大的差異即在：我可不可以選擇。

關鍵詞：民族認同、台灣人認同、中國人認同

壹、前言

自從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 2012 年 3 月 22 日對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公開要求：「兩岸雙方可以通過加強兩岸文化交流，宣導認同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的理念，增進台灣同胞身為中國人的認同」之後，改變台灣人的認同成為中國人認同，就成為中國對台政策的重點，中共新的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仍然如此強調。

「台灣競爭力論壇」於 2013 年 2 月 27 日公布一份「台灣民眾國族認同」的民意調查結果，其新聞稿聲稱：「民調顯示，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達 61%，否定者，有 35%，而在法理與現實考量上，堅持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者，有 29.2%，此項數據顛覆以往調查 - 『台灣人在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問題上，否定比例超過正面比例』的印象。」(台灣競爭力論壇，2013)

事實上，這份民調不只顛覆了以往的調查印象，它還顛覆了關於認同的理論與概念。台灣競爭力論壇理事長彭錦鵬表示，過去民調通常是問民眾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但這份調查最大的不同，是提問已排除「是不是台灣人」的問題，因為中華民國遷台七十年來，多數國人生於斯、長於斯，「是不是台灣人」已無庸置疑，大家都是台灣人，這一點無須爭議，在此基礎之上，同時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民眾，確實高達六成。台灣不能繼續在認同問題上內耗下去 (陳文信等人，2013)。

簡言之，這份民調是改變以往的提問方式而得到「不同的結果」或「真正面貌」，如同其新聞稿所言：「以往大部分的調查機構，都以「分裂式」的問法，將認同問題分為台灣人 / 中國人二個選項，讓民眾選擇其一，這當然使得自認為台灣人的比例遠高於自認是中國人。本次調查以全新的思考取向，試圖了解台灣民眾國族認同的真正面貌，在中國人認同的問題上，以「融合式」的問法提問，直接詢問「請問您認為自己是不是中國人」，或在詢問台灣人與中國人的關係時，在四個認同類別中，均加上自己是台灣人做為前提，如「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是台灣人也可以是中國人」、「是台灣人，但不必否認是中國人」、「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這種「融合式」

題目設計的精神，就是認為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本是天經地義再自然不過的道理，因此不需要讓民眾選擇自己的身分認同，目前社會上的爭議點是，台灣人是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我們認為這樣的問法更貼近台灣民眾對中國人認同真正的想法。」(台灣競爭力論壇，2013)

此處，對國族認同的民意調查改變其提問的方式，就意味著對國族認同的概念存在一套不同的假設，而所謂的「分裂式的問法」或「融合式的問法」，更直接涉及到如何認知與理解認同的理論內涵，以及認同如何建構等問題，可惜的是，「台灣競爭力論壇」並沒有在這些重大問題上多所著墨，但本文仍可根據其所發表的問卷設計與成果，及其後他們所舉辦的「2013台灣民眾國族認同」研討會內容來進行分析與討論。

為了能有效釐清認同理論的爭議，本文不質疑「台灣競爭力論壇」的意識形態取向或政治目的，但關心會不會為了意識形態取向或政治目的而扭曲或誤解了認同的概念，因而走上錯誤的建構認同的道路，使得這個問題治絲愈縈，導致台灣社會又陷入不必要的內耗。

為達此目的，本文的兩個基本假設是：一、認同的本質就是對比、差異與分裂，而融合屬於建構的過程，目的是消除差異而達到新的認同。二、台灣認同之所以出現，恰恰是相對於共產主義中國而形成的差異，包括民主自由與一黨專政的對立、社會價值一元與多元的摩擦，政策上壓制與反抗的互動的整體歷史積累。

基於這樣的假設，本文將從認同概念的起源著手，尤其聚焦在分裂或融合這個領域，歸納相關的理論，繼而彙整台灣認同構成的理論說明，進而與「台灣競爭力論壇」的「台灣民眾國族認同」文本進行對話，當然，在這麼做之前，有必要先整理「台灣競爭力論壇」對台灣認同的解釋及其問卷設計的意義為何。

貳、「台灣競爭力論壇」的文本

根據其「新聞參考資料」的說法為「2008年馬政府執政後，在『一中各表、九二共識』的基礎之下，兩岸簽署的18項協議、兩項共識，兩岸的

『中國人認同』是否真的出現轉折？台灣與中國的認同不再是撕裂，而是朝向彼此認同的方向邁進，代表政府的兩岸和平發展之策略方向正確，因而改變台灣民眾的認同結構。」(台灣競爭力論壇，2013)

這段話的意思是指：08 年馬政府執政後台灣與中國的認同不再是撕裂，而是朝向彼此認同的方向邁進，代表政府的兩岸和平發展之策略方向正確，因而改變台灣民眾的認同結構，也代表「一中各表、九二共識」也把台灣認同帶到中國認同。

其次，這分問卷有關認同的提問內容與結果如下：

問卷第 1 題，中華民族具有共同血緣、語言歷史文化，請問您覺得自己是不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第 2 題，請問您認為自己是不是「中國人」？結果，90.4% 的台灣人，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61% 的台灣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由一、二的調查結果，他們得到的結論是中華民族認同，是台灣內部也是兩岸之間血緣認同的最大公約數。在第一題與第二題做交叉分析顯示，有 28% 的人雖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顯示這群民眾在血緣、文化上認同中華民族。

繼而，問卷將中國人的認同問題，分兩種變項，四個細目，再做調查，分別是：

一、兩個變項

1. 以法理、現實為主軸：即第 3 題：「法理上，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現實上我們是生活在台灣的台灣人，請問您個人認為台灣人與中國人的關係」。
2. 以台灣利益的務實考量為主軸：即第 4 題：「面對大陸的發展，請問您覺得台灣人與中國人應採取何種關係，既能確保台灣利益，又能有利兩岸和平發展」。

二、四個細目

1. 積極認同：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2. 消極認同：是台灣人也可以是中國人。

3. 被動認同：是台灣人，但不必否認自己是中國人。

4. 否定認同：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調查結果是：以法理及現實為主軸的變項下，「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回答，由第二題「是否認同為中國人」的 35.4% 下降到第三題的 29.2%。以台灣利益的務實考量為主軸的變項下，「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比例更下降至 22.9%。他們的解釋是：1. 面對強大而有威脅的中國大陸，相對而言，台灣人有著「害怕受傷害情結」，對大陸及兩岸關係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因此若在調查中，帶有強迫式或威嚇語氣來進行認同問題調查，絕對會反彈出較強的否定認同。2. 第 4 題回答為「台灣人不必要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的選項，獲得最大比例的認同 32.8%，進一步說明，有相當多的台灣民眾，並不會主動去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的身分，而這「中國人」的身分，主要反應對於中國文化的認同，或是血緣上的關係。

從「台灣競爭力論壇」的問卷設計及其對調查結果的解釋，我們可以很容易的歸納出，他們對認同的理解是這個樣子的：相當多的台灣民眾，並不會主動去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的身分，而這「中國人」的身分，主要反應對於中國文化的認同，或是血緣上的關係。此處，又對應到「中華民族」，於是，台灣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與中國人這四者之間被巧妙的等同起來。

假如筆者對「台灣競爭力論壇」的理解無誤的話，接下來本文將進行理論方法的討論，與之對話。

參、認同的來源與台灣認同的構成

一、認同的來源

對於民族認同(作為民族主義的基礎)的分析, Anthony D. Smith(Smith, 1999) 歸類了四種研究途徑分別為：原生論、恆久論(perennialist)、現代論與種族象徵論(ethno-symbolic)，他把社會生態學的宗族論與文化決定論，特別是認為「文化是民族不朽的本質」都視為是原生論；至於恆久論

主張的不是源於某種自然秩序，而是主張本民族有史以來就存在，緊跟這種論述的就是「民族復興論」。Anthony D. Smith 對原生論與恆久論的質疑是：「他們生動的辨認出問題，但卻不能提供任何解決方案」。

同樣的，John Rex 與 David Mason (1985: 2-6) 區分成「原生論」與「系絡論」(contextualist) 兩大類，前者將民族主義回溯到人的直覺行為與原始社會；後者則將民族主義視為特殊經濟與社會環境之下的產物，且特別強調它與現代的關係。James G. Kellas (1991: 159) 則認為在研究種族中心主義發展成民族主義、種族性變成民族性時，「原生論」型式的理論爭議性太大，它本身簡直就是一種民族主義的論述，而不是分析解釋的工具，因此只能將之暫置一旁，而從系絡條件著手。

若把族群 (ethnicity) 概念作為討論的起點，從系絡論來看，它包含文化要素；該要素必須對一特定群體的人民有認知、意識上的價值 (conscious value)，方能形成族群的概念。「族群」需具備「歸屬感」(belonging) 及成員與非成員間的「界線」(boundary)；不過，「族群界線」的定義相當模糊、多變。族群之所以複雜，乃因其並非僅由單一要素所構成；語言、宗教、疆域、習俗等因素皆對其概念的形有所影響，並形成一「集體價值」(collective value) (Enloe, 1996: 189-97)。

此外，從家庭到全人類之間，每個人都同時存在很多種認同，其中有些屬於特定利益團體的認同，但在討論民族認同時，則著重在基本文化要素所構成的集體認同，根據 Anthony D. Smith (1995: 131) 的研究，這些基本文化要素有四類：

1. 一種屬於特殊文化人口單位的穩定根源感。
2. 一種屬於這個文化單位的差異、區分與分離 (separateness) 感。
3. 一種屬於這個文化單位藉由記憶、神話與傳統代代相傳的連續感。
4. 一種屬於這個文化單位的尊嚴、使命、共有的希望與夢想感。

Manuel Castells (2002: 6-8) 把認同的形式與起源分為三種及其後果：

1. 合法化的認同 (legitimizing identity) 由社會的支配性制度 (institution) 所引介，以拓展及合理化他們對社會行動者的支配。這是 Richard Sennett、Ernest Gellner 與 Benedict Anderson 理論的主題。它會產生市民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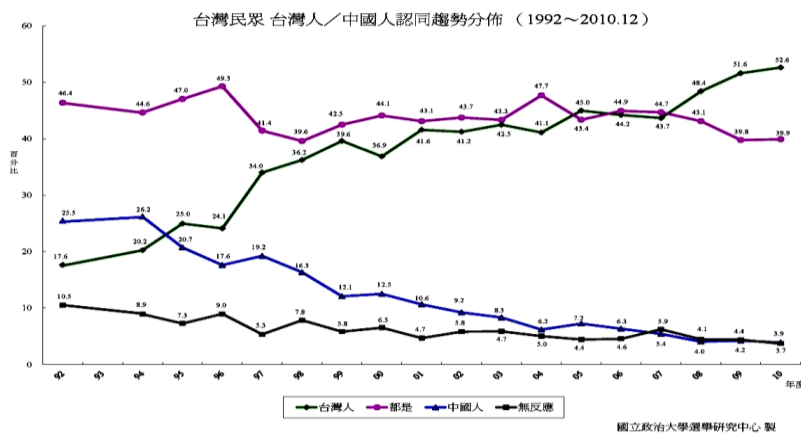
2. 抵抗性的認同 (resistance identity)，它是指在支配邏輯下位於被貶抑或汙名化處境的行動者所產生，他們建立抵抗的戰壕，並生存在以不同或對立於既有社會體制的原則基礎上，如 Craig Calhoun 的理論說明。它會產生公社或共同體 (community)。

3. 計畫性的認同 (project identity)，指當社會行動者基於他們能獲得的文化材料，建立一個新的認同以重新界定他們的社會位置。

綜合上述學者們的看法，認同的基礎在於差異與界線，如同 Anthony D. Smith 所說的，屬於這個文化單位的差異、區分與分離感。也像 James G. Kellas 所強調的，「族群」需具備「歸屬感」、及成員與非成員間的「界線」。於是，並不存在所謂的「融合式」的認同，若要談到融合，那是指建立一種新的認同，那麼就要看是走合法化的認同、抵抗性的認同或是計畫性的認同的道路，來完成它。

二、台灣認同的構成

台灣民眾認同的變化，根據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連續民調(如圖 1：台灣民眾認同趨勢分佈圖)顯示，認為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在 1992 年有 46.4%，在 2010 年降為 39.9%；認為我是台灣人的，從 1992 年的 17.6%，升到 2010 年的 52.6%；認為我是中國人的，從 1992 年的 25.5%，降到 2010 年的 3.9%。無反應的比例從 1992 年的 10.5%，降到 2010 年的 3.7%。



過去二十年台灣民眾認同的變化，中國人認同下降至極少數的 3.9%，台灣人認同的比例已經升到過半數的 52.6%；而台灣人與中國人二者都是與無反應者，也分別緩慢降到 39.9%與 3.7%。所有的發展趨勢都指向一個方向，即台灣人認同將會越來越高。

與此相類似的調查有 2009 年 5 月研考會公佈的民調，在台灣人或中國人的認同指標上，高達六成五的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僅一成一自認是中國人。在台灣人或中國人的認同指標上，比較研考會這三年的民調結果，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略有起伏，但都超過六成。這三年依序是六成三、六成七、六成五。自認是中國人的比例呈現逐年下降，2007 年有一成五四，2008 年降至一成三六，2009 年則再降至一成一五(黃維助，2009)。

還有 2009 年 12 月天下雜誌的民調，國情調查所示，已有超過 60%的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這個民意調查最值得注意的是，在 18-29 歲的年輕人這個階層，有 75%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因此，至少在可見的未來，台灣人的認同還是會持續上升(蘇永耀，2012)。

這些民調都顯示出一個事實，過去即台灣人民的認同，包括馬英九總統執政期間，都是穩定而持續的上升，中國人的認同則是穩定而持續的下降。

至於，上述的台灣認同是如何構成的？孫同文、王家英(2005)曾經把 90 年代台灣國族認同的學術研究，區分為歷史結構研究和社會調查研究兩大類：一、在歷史結構分析方面，構成台灣民族認同的因素，包括林勁與方孝謙的日本殖民統治影響、張茂桂與戴國輝的省籍情結因素、戴寶村、Chun 與王甫昌的國民黨國家機器的影響與反對運動；王家英、石之瑜的兩岸對立和台灣民主化因素等。二、在社會調查研究方面，則嘗試釐清認同結構與各種社會、政治、經濟、族群等因素的關聯性。

江宜樺(1998)則把將台灣社會各種認同理論觀點分為三大類：一、民族主義，從血緣、文化、甚至共同命運等不同角度來論述其國家認同；二、自由主義，將國家本身的憲政制度與人權保障視為認同國家的關鍵；三、激進主義，試圖推翻以「國家」作為建構國家認同主體性的合法性。事實上這樣分類都在民族主義的解釋範疇內，並可以跟原生論、恆久論、

現代論與建構論相對應，換言之，民族主義並沒有跟自由主義或激進主義相對立，而是分屬不同的民族主義脈絡。

整體而言，台灣認同研究的特徵，就如同張茂桂(2005:158)所說的，大都是中華民國近代史、台灣現代化經驗脈絡下的研究。侷限於台灣人的「特殊」歷史、特殊的「成功」的民主化經驗、總結在「特殊」的台灣族群經驗之中。即使對於「外省人」這樣的「外來者」，也大致是從1945、1949年「之後」來進行研究的。他們使用的概念「殖民統治」、「國家機器」與「民主化」，即使是所謂的「省籍情結」、「國共鬥爭」與「兩岸對立」也都是在民族主義 / 民主自由與共產主義 / 專制獨裁的現代化歷史敘事的範圍內，而把台灣民族認同的構成放置在「壓迫—反抗」的模式中來闡述。

例如，Steven E. Phillips (2003) 強調：「1945-1950年歷史發展對台灣認同的影響」，並認為「228事件是當代台灣歷史政治的分水嶺」。陳陸輝等人(2009:41-51)對台灣族群認同的起源所做的文獻檢閱，同樣的歸因為「台灣近代特殊歷史文化環境，台灣人民過去被壓迫經驗是一個重要因素」，在確認「壓迫經驗與不平等身分，是影響民眾台灣認同的重要因素」的情況下，轉換成「把台灣意識視為兩岸關係中的『情感認同』因素」、「將省籍背景、族群認同、政黨認同、台灣意識等變項列為『感性認同』」，而在兩岸經貿交流的分析中得到「看似『理性自利』的『自評利益』因素，其實深受『台灣意識』與『台灣認同』之類感性因素所決定」的結論。

又如施正鋒(2002)歸納出三種架構：原始主義、結構主義以及建構主義，並試圖結合這三種詮釋架構回應「台灣人到目前為止如何想像自己」，而主張「台灣民族主義是用來脫離國民黨奴役的宰制、並且拒絕中國併吞台灣的可能性；而從較積極的觀點來看，台灣民族主義的最高目標在於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從以上各個學者的研究成果來看，台灣人的認同最早是相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繼而是相對於國民黨的高壓統治，最後是相對於中共(代表中國)的文攻武嚇政策而存在的，假如說台灣人的認同早期的對照組是日本人而產生，那麼戰後台灣人的認同對照組是中國人，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換言之，台灣認同之所以存在是與中國人認同畫出界線而來的，進而針對中

國人的對台態度與中國本身的發展與對未來的夢想，台灣人抵抗打壓與感受到差異因而強化其認同。

至於，2008年馬政府執政後，兩岸和解及中國對台政策側重懷柔，為什麼台灣人認同持續上升，中國人認同持續下降，這部分有許多學者做了大量而豐富的調查及研究¹。本文首先介紹林瑞華、耿曙(2011:133-60)所做的在大陸台灣人的階級與認同訪談研究，針對台灣認同沒有改變的那一部分人，所做的解釋是，在大陸的台商，認同自己為「台灣人」者，在台灣和中國之間劃出一條涇渭分明的線，這條線不但區隔出文化差異，也劃出「台灣人我群」和「大陸人他群」。原初的文化聯繫(此處指的是中華文化)，並未牽動台商拋卻台灣認同，即便有部分台人決定長居當地，亦不易牽動認同轉變。

湯紹成(2011)的解釋列舉了5項，分別是：(1)台灣原本老一代外省人紛紛凋零，解除戒嚴後，台灣人的意識開始抬頭，(2)兩岸分隔至今已逾一甲子，生活與思想的方式差異甚大，(3)李登輝後期與民進黨執政八年所塑造的台灣主體性的時代氛圍，(4)台灣民眾對於大陸的觀感不佳，包括北京對台不放棄武力與外交圍堵，以及共產黨專政，(5)惠台政策多被中間商以及大財團吸收，一般民眾的感受並不明顯。

陳陸輝等人(87-125)的解釋是，面對「台灣意識」的對抗，持續不斷的「惠台政策」——試圖透過讓利、補貼來促進兩岸的統合——其成效恐將有時而窮。真正能夠破解民眾疑慮、創造共榮條件的關鍵，恐怕不在「利益」而在於「尊嚴」。王信賢、柯采霽(2010)的解釋是，由於馬政府上台後積極的兩岸政策引發部分民眾的焦慮，使其原本隱蔽於「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以及「維持現狀」中的態度轉變為「顯性」(我是台灣人以及「獨立」或「永遠維持現狀」)，再加上許多民眾並未在兩岸交流中獲利而影響其認同，或可能因交流變多，認識也增加而更加區分「你」、「我」，故在「認同」上往「疏離」的方向前進。

吳乃德(2011)的解釋是，雖然大多數民眾對經濟交往持正面的態度，

¹ 相關的討論，請參閱董立文(2012)。

認為它有利於台灣經濟的長期發展，同時對於台灣的認同也沒有變動，可是他們仍然非常清楚密切的經濟交往可能帶來的政治和經濟後果。政治上，它可能會讓台灣的主權受害，也限制了台灣未來政治選擇的空間。經濟上，它惡化所得分配、擴大貧富差距。有著這樣清楚認知的選民，或許任何政治領袖都很難加以愚弄或唬弄。

張茂桂（2011）提出的解釋是，因為至今交流過程都具備了選擇性、也有特殊方向性，所以效果也具有「排他性」，不一定符合廣泛的公共利益的要求。陳志柔（2011）的調查發現台灣的社會分化及群體差異可能對兩岸政策存在差異性的態度，這些差異的形成和後果，不僅展現台灣社會的分化，也呈現了中國崛起和兩岸關係劇變下，對台灣產生的社會效應。以及林宗弘（2011）研究：兩岸經貿關係的擴張在不同階級以及產業部門間的利益分配不均，可能已經導致台灣民眾貧富差距惡化，並且影響了各階級選民對藍綠兩黨的支持程度。

歸納上述學者所言，為什麼兩岸越交流，認同越分離的解釋有三種：第一是，「感性認同超越理性自利論」，第二是，「社會階級分化論」，第三是筆者提出來的「民主要素論」，關於第三種解釋稍後說明，此處必須先處理中國人、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的問題。

肆、中華文化的爭論

中華民族這個詞，雖然在政治上經常被使用，但在研究台灣認同，甚至是研究中國人認同上，它很少被納入研究範圍，因為「中華民族」在中國歷史上很晚才出現，是一個非常含混的民族想像，沒有人會說它屬於血緣族群的認同，但若說它是「中華文化」認同，則直接處理文化即可。中華文化在台灣人認同裏所扮演的角色，則是一個爭議性很大的問題。

除了少數個案研究認為，兩岸的文化斷層造成兩岸認同的差異之外²。

² 例如楊渡（2010）的訪談研究，從更細緻的兩岸文化交流面向著手，包括文字與電視劇等，而認為兩岸分治以來，台灣使用正體字，但大陸的簡化字因簡化太過，而造成大多

一般人都認為中華民族具有共同血緣、語言歷史文化，就像「台灣競爭力論壇」所描述的那樣，或是描述為兩岸具有共同的中華文化基礎，因此都是中華民族。當然，這個中華民族的涵意就是中國人。這種想法屬於文化決定論，無論是台灣文化或是中華文化，可能都陷入了把文化認同等於政治認同的迷思。

文化當然是政治或民族認同的因素之一，但並非必要條件，尤其是考慮到兩岸關係的特殊性時，一方面，在政治上，有越來越多主張台獨的人，並不否認台灣與中國的文化關聯，這意味台灣民族認同與中華文化的關係是多變的。簡單的說，雖然兩岸都被籠統的歸類在中華文化的範圍內，但是兩岸對中華文化的理解與繼承方式有很明顯的不同，甚至，在如何重建中華文化傳統的問題上，兩岸各自內部就有許多對立的意見，遑論兩岸之間。

如同江宜樺(1997: 85-110)所說的，當一個人宣稱認同某國時，他可能既認同該國之民族習俗、歷史文化，也認同其政治制度、公民權義、外交地位等等。但是他也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只以其中一個層面為表達認同的根據。譬如當一個人宣稱自己是台灣人時，他可能既熱愛台灣民俗文化也支持台灣獨立建國；但另一個號稱是台灣的人，則可能只是認同台灣所形成的生活文化，而不以為台灣應該脫離中國。反過來，當一個人稱自己是中國人時，他可能既熱愛中國五千年文化，也力促中國在政治上統一；而另一個作同樣聲明的人，則可能只是欣賞文化中國的資產，並肯定自己的語言思惟出於此一傳統，但不認為政治上自己是中國人。

另一方面，中華文化的「困境」，如同 P. Steven Sangren (1998) 所說的，在中國國家機器控制著意識形態的狀況下，它不再是定義「中國性」(中華文化)的合適環境；在台灣，國家中心主義意識形態越來越被認為是時代的錯誤，愛國主義又被認為是不合時宜，這標誌著台灣文化多元化與「綜合多元認同」的出現。特別是針對主張中國統一的中華文化決定論。蕭欣義(1998: 23-40)主張雖然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可能相互重疊，但兩者並不必然是一樣的，文化中國並不自動意味著其中所有成員一定要是同一政

數人民閱讀傳統典籍的困難，阻斷了他們直接認識中華文化，造成文化傳承的斷層。

體內的成員。在文化中國中，把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認同，強加於所有的成員會給世界和平帶來巨大不安。

蕭高彥(2006:205-35)則更清楚的把中共的民族文化觀稱為「政治性的文化民族主義」，其所承載的並非文化，而是國家，其意涵在於中國崛起的政治現實可以辯證的揚棄/克服之前所有發生在中國的文化斷裂，並做為未來形構普遍價值的要素。於是，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面對一個啟蒙辯證的困境，即對歷史傳統延續性的訴求，如何與共產主義促成近代中國的激進反傳統主義之斷裂加以調解？從而提供當前中國崛起所需要的文化民族主義歷史價值？

文化認同作為一種歷史主義，特別會從原生論與恆久論來強調其種族的先天性與傳統的歷史性，問題是共產主義中國在對台灣做這樣的宣示時，幾乎從菁英文化到俗民文化，都面臨兩個困境：一、談發揚中華文化傳統，但台灣卻是保持中華文化傳統最完整的地方；二、談振興中華文化傳統，但中國共產黨對傳統文化的革命與反叛，卻讓台灣記憶深刻與恐懼厭惡。

即便談到「共同的中華文化」，用在融合於「中國人的認同」時，也是虛幻多於實際，因為當談到中華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該如何定位與解釋那些經典？該保存與突顯哪些價值？該如何應用於現代社會？不要說兩岸之間有巨大鴻溝，連各自內部也爭論激烈。否則，台灣為什麼要成立「台灣學院」，以區別中國的「孔子學院」？遑論台灣的新儒家之辯與中國的馬克思與孔子之爭，都尚未結束。

伍、台灣人認同的民主要素論

本文認為，民主自由認同不但是台灣認同重要的構成條件，還是解釋兩岸交流緊密化與台灣認同強化同時並進的關鍵因素，換言之，民主自由是區分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的重要界線。首先，在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同時發展且相互促進方面，相關的研究包括：

游清鑫與蕭怡靖(2007)以政黨輪替後民眾對於民主實行滿意度、民

主信念及民主價值進行長期分析，研究結果發現，2004年總統選舉後的一連串政治風波，雖然導致民眾對台灣民主政治實行的滿意度大幅下滑，但民眾在民主信念及民主價值上出現上揚的趨勢，尤其「後九二世代」對民主價值的認知更是高於「前九二世代」，這樣的結果結合前述新選民在統獨議題與族群認同態度的分佈，將有利於台灣民主政治的推展。

施正鋒(2007)認為，假如國家願意正式承認多元族群的社會，誓言要以文化發展來保障少數族群的生存，從事族群之間的歷史和解，促進整個社會的和平；另一方面，國家同意政治規範族群彼此的關係，特別是透過政治參與的保障來表達權力分享，以提高國家體制的正當性，終極而言，將有助於民主制度的鞏固。

孫煒(2010)發現：台灣民主化中，為了促進族群和諧，進行憲政體制中分權制度設計或調整，強調在行政部門中設置以族群為基礎的代表性行政機關，台灣近年推動民主化的重要意義就在於產生更高包容力與多元性的文化變遷與規範建立。在此系絡之中，族群政治由隱約曖昧而逐漸彰顯其關鍵地位，台灣政治決策者肯定在台灣民主化中族群多元文化的正當性。

張佑宗(2011)透過統計模型的分析，發現台灣的民主經驗顯示，隨著台灣民主的持續，直接的民主支持很快獲得社會的認同。民主價值與傳統文化能相容的部份，很快就能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兩者若有不相容的部份，就必須要有一段調適的過程。

上述針對台灣認同與民主化關係的研究結果，也都符合早先的理論預期，包括 Rasma Karklins(1994)主張，多元族群的社會不僅不一定會有礙民主化的推動，甚至於，在提供各種不同的制度設計、以及領導者之下，反倒是有助於民主化的進行。Jack Snyder(2000: 29-32)則認為，雖然許多新興民主政體在民主化的初期面臨大眾的政治參與、政治菁英對失去政治權力的恐懼等，這些因素都刺激了族群的政治動員和族群關係的緊張，不過就長期而言，民主鞏固其實是可以降低族群衝突的。因此，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的確同時發展且相互促進。

其次，在民主自由是區分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的重要界線這方

面，王甫昌（2008：89-140）的研究發現，台灣「族群政治對立」與衝突的出現，不再是發生在「族群身份團體」（「本省人」相對「外省人」）之間，而是發生在不同的「族群意識論述」，特別是過去被用來合理化抗拒民主改革的「中國主體意識」、與被用來支持要求民主改革的「台灣主體意識」之間。他透過調查資料的分析指出，本省籍民眾「族群政治意識」在政治轉型前後的升高，是讓此一轉型能夠完成的重要社會條件。

綜上所述，台灣的民主已經鞏固，台灣人的民主信念已經根深蒂固。在早期，台灣的民主化容或促成台灣認同的分化，但終究台灣認同分化也助長民主化的進行，在後來，民主化反過來成為台灣認同的構成因素。從民主的角度來看，文化認同決不等於政治認同，本文贊成高全喜（2006：237-56）所說的：「現代社會存在著兩種認同，一種是文化認同，一種是政治認同。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政治認同，即在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共和憲政制度的政治認同方面達成共識，並致力踐行，或許更為性命攸關。」

顯然的，台灣人民的認同源於合法化認同及抵抗性認同（抵抗中國），中國人民的認同則源於計畫性認同及抵抗性認同（抵抗帝國）。1949年之後台灣人民代代都是在中國政治封殺與武力威脅下成長的，「亞洲的孤兒」是其最好的註腳，反抗中國的抵抗性認同自然成為台灣認同的重要成份。另一方面，台灣是一個自由開放多元的社會，本土化、全球化與中國化開放競爭。中國的認同源自於中國共產黨的愛國主義教育，是計畫性的意識型態灌輸，不允許異質思想的挑戰，同時，中國又有根深蒂固的受帝國主義迫害歷史觀，「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是其最好的註腳，反抗西方的抵抗性認同構成其民族主義的基礎。

不同的成長環境與背景，使台灣人民的認同與中國人民的認同既無法相容且針鋒相對。恐怕這是過去二十年來，兩岸經熱政冷、交流越近認同越遠的最佳解釋。此處，吾人可以把台灣認同歸納為，對精英來說是抵抗的建構，對人民來說主體的自我選擇，上下階層的橋樑是自由民主與人權。

陸、結論

本文的結論很明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與「中國人」這三者無法簡單的等同起來，中華文化是中國人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重點在於不能把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三者混淆，其道理就像英國人、美國人與盎格魯撒克遜文化之間的關係一樣。

從「台灣競爭力論壇」的問卷及其說明而言，在理論上，筆者期待它們能提出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概念為何？所謂的「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的定義為何，更重要的是說明，所謂的作為兩岸共同文化基礎的具體內容究竟是什麼？如此，不同的意見才能有效的溝通，才能符合邏輯的進行辯論。

其次，在實務上，或許可以針對既有的研究成果，設計成問卷，直接調查台灣人民的態度，此意即，假如兩岸越交流，認同越分離的原因是感性認同超越理性自利、社會階級分化與民主自由，那麼直接在這三個領域設計題目，調查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是否存在差異與界線，假如調查結果不存在差異與界線或很少，這就真正的顛覆了過去的調查紀錄與研究成果，反之，也可證明「台灣競爭力論壇」的主張不成立。

最後，所謂「融合式」的問法，即「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是台灣人也可以是中國人」、「是台灣人，但不必否認是中國人」、「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這種問法，在理論上是混淆認同，達到消除差異與界線的目的，去認同化的結果是讓認同失去意義，例如，把上述四個問題前者的台灣人換成香港人、西藏人或新加坡人；或把後者的中國人換成日本人、美國人或地球人，都可以得到結果進行分析，但這麼做有何意義？

其實，「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這種問法是有理論爭議，國內有些民調已去除這個選項，單純分開問來探測台灣人民真實的心態。存在「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這個選項，恰巧反映出部分台灣人無奈、矛盾、等等看或無所適從的複雜心理，那麼擴大這種問卷的提問，不但得不到台灣人民真實的心態，反而是擴大台灣認同的無奈、矛盾、等等看或無所適從的

範圍，它的客觀結論就是軟弱的台灣人認同與脆弱的中國人認同。難怪參加「台灣競爭力論壇」民調研討會的唐湘龍會說：「台灣民眾對國族認同其實很變色龍」(王超群，2013)。

順帶值得一提的是，被「台灣競爭力論壇」邀請參加民調研討會的專家學者，幾乎沒有人正面呼應「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達 61%」這個部分，反而，與會的專家學者談話的出發點，是從「台灣認同越來越高、中國認同越來越低」開始的，例如，李允傑說「強調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必須由下而上開展民間對話，才能促成台灣人民的認同」。張亞中指出：「兩岸的政治認同已經發展成異己關係，台灣民眾的認同光譜，目前以中華民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區分不同政治歸屬，這是台灣主流」。謝大寧表示：「台灣政治認同逐漸鞏固，但對「中華民國」的認同則在飄移，這兩股力量不斷拉扯」(王超群，2013)。這些發言，都是在推翻「台灣競爭力論壇」的調查結果。

「台灣競爭力論壇」的說明有一句話是：「不需要讓民眾選擇自己的身分認同」，也許，「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最大的差異即在：我可不可以選擇。用政治手段來建構民族文化，並不代表可以將某一種特殊性文化認同建構成普遍性文化認同，而要求他者承認與接受，如同 Anthony D. Smith 所說的：「去建構與發現是一回事，而確保其成功的讓人民接受是另一回事」。

參考書目

- 王甫昌, 2008。〈族群政治議題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的角色〉《台灣民主季刊》5卷2期, 頁89-140。
- 王信賢、柯采霽, 2010。〈兩岸交流與台灣民眾認同變遷: 2008年以來的分析〉發表於台北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辦「續與變: 2008-2010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10月2日。
- 王超群, 2013。〈兩岸一中二憲 國族認同如變色龍〉《旺報》3月5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2955/112013030500201.html>) (2013/5/1)。
- 台灣競爭力論壇, 2013。〈2013 台灣民眾國族認同第一季調查結果〉 (<http://tcf.tw/phocadownload/2013/02/20130227handbook.pdf>) (2013/5/1)。
- 江宜樺, 1997。〈社群主義的國家認同觀〉《政治科學論叢》8期, 頁85-110。
- 江宜樺, 1998。〈當前台灣國家認同論述之反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9期, 頁63-229。
- 吳乃德, 2011。〈「中國崛起」的政治效應: 民族認同和政黨支持〉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中國效應在台灣研討會。台北: 4月23日。
- 林宗弘, 2011。〈兩岸貿易與台灣階級政治的發展〉,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 《中國效應在台灣》研討會, 台北, 4月23日。
- 林瑞華、耿曙, 2011。〈「階級差異」或「認同制約」? 大陸台灣人當地融入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54卷4期, 頁133-60。
- 施正鋒, 2007。〈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族群政治〉《台灣民主季刊》4卷4期, 頁177-89。
- 施正鋒, 2002。《台灣民主鞏固的擘劃 - 政權輪替與制度改革》。台北: 前衛。
- 孫同文、王家英, 2005。〈在台灣國族認同和中國國族認同之間: 一個Q方法論的補充〉《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9期, 頁123-61。
- 孫煒, 2010。〈我國族群型代表性行政機關的設置及其意涵〉《台灣民主季刊》7卷4期, 頁85-136。
- 高全喜, 2006。〈文化政治與現代性問題之真偽〉思想編委會(編)《天下、東亞、台灣》頁237-56。台北: 聯經。
- 張佑宗, 2011。〈選舉結果、政治學習與民主支持 - 兩次政黨輪替後台灣公民在民主態度與價值的變遷〉, 《台灣民主季刊》, 8(2): 99-137。
- 張茂桂, 2005。〈書評: 《重建想像共同體 - 國家、族群、敘述》〉《台灣民主季刊》2卷3期, 頁155-64。
- 張茂桂, 2011, 〈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後的政治、社會反應〉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

- 學研究所主辦「中國效應在台灣研討會」。台北：4月23日。
- 陳文信、唐筱恬、楊毅、徐子晴，2013。〈台灣認同高 無礙於中國認同〉《中國時報》3月5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2955/112013030500091.html>) (2013/5/1)。
- 陳志柔，2011。〈台灣社會分化與兩岸政策：性別、社會階層、政黨認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中國效應主題研究小組第一次研討會」。台北：4月23日。
- 陳陸輝、耿曙、涂萍蘭、黃冠博，2009。〈理性自利或感性認同？影響台灣民眾兩岸經貿立場因素的分析〉《東吳政治學報》27卷2期，頁87-125。
- 陳陸輝、耿曙、鄭夙芬、游清鑫，2009。〈台灣認同的起源與政治效果之研究〉(NSC 95-2414-H-004-051-SSS) 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 游清鑫、蕭怡靖，2007。〈以新選民的政治態度論台灣民主政治的未來〉《台灣民主季刊》4卷3期，頁109-51。
- 湯紹成，2011。〈台灣認同問題的弔詭〉《國政評論》(<http://www.npf.org.tw/post/1/9575>) (2013/5/1)。
- 黃維助，2009。〈研考會民調 6成5民眾自認台灣人〉《自由時報》5月28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may/28/today-t1.htm>) (2013/5/1)。
- 楊渡，2010。〈從民眾觀點看兩岸關係的回顧與展望〉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 董立文，2012。〈兩岸和平的墊腳石或絆腳石 - 認同 vs 民主〉發表於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主辦「兩岸和平制度化學術研討會」。8月23日。
- 蕭欣義，1998。〈一個『文化中國』之多元政治認同〉《香港社會科學學報》11期，23-40。
- 蕭高彥，2006。〈『文化政治』的魅力與貧困〉收於思想編委會(編)《天下、東亞、台灣》頁205-35。台北：聯經。
- 蘇永耀，2012。〈新世代國家認同 民調：越來越偏向台灣意識〉《自由時報》3月13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may/13/today-fo1.htm?Slots=All>) (2013/5/1)。
- Anthony D. Smith. 1995.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Henry Harris, ed. *Identity*, pp. 129-5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Castells, Manuel (夏鑄九、黃麗玲等譯), 2002.《認同的力量》。台北：唐山出版。
- Enloe, Cynthia. 1996. "Religion and Ethnicity," in John Hutchinson, and Anthony D. Smith, eds. *Ethnicity*, pp. 189-9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llas, James G. 1991.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hillips, Steven E. 2003.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Independence: The Taiwanese Encounter Nationalist China, 1945-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asma, Karklins. 1994. *Ethnopolitics and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and Latvi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Rex John, and D. Mason, eds. 1985. *Theories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ngren, P. Steven, 1998. 〈人類學與台灣的認同政治〉《香港社會科學學報》11 期, 頁 41-72。

Smith, Anthony D. 1999.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nyder, Jack. 2000.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Contesting Taiwanese Identity and Chinese Identity

Li-wen Tu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Security,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Kueishan, Taoyuan, TAIWAN*

Abstract

There are two basic assumptions about national identity. First, while the essence of identify is contrast, difference and division, fusion is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differences and achieve a new identity. Second, Taiwan's identity has arisen precisely relative to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st China differences, including democracy and freedom relative to the one-party dictatorship, single social value relative to diversity of social value, suppression relative to resistance. The largest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 identity" and "Chinese identity" is whether I have a choice.

Keywords: national identity, Taiwanese identity, Chinese identity